

内外之间：

*Internal or External: Problems and Methods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Study*

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张桃洲 孙晓娅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内外之间： 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Internal or External: Problems and Methods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Study*

张桃洲 孙晓娅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内外之间：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张桃洲，孙晓娅
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8
ISBN 978-7-5097-3562-6

I. ①内… II. ①张…②孙… III. ①新诗-诗歌研究-
中国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4641 号

内外之间：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主 编 / 张桃洲 孙晓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魏小薇

责任校对 / 张延书 孔 勇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562-6

定 价 / 69.00 元

印 张 / 20.25

字 数 / 331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在突围中寻求生机

——新诗研究断想（代序）

张桃洲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新诗研究有其特殊的位置，这大概是诗歌文类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多年来，新诗研究总是在相对封闭的框架中，在经过一轮轮充满悖论、冲突甚至对抗的颠覆与重建之后，实现着自身美学趋向的更迭和问题疆域的转变。除了古今中西之类的宏观命题外，内与外之别、自律与他律的分歧、个体与集体的龃龉、审美与政治的纠缠等，是集结于这些年新诗研究领域的挥之不去的议题。每过一阵，上述议题的变种就会以不同的面目膨胀出来，激起或大或小的徒劳无益的论争。

为何与其他文类研究相比，新诗研究总能引发更多的论争？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疑问。在一定意义上，当前的新诗研究同诗歌创作有着相似的命运，那就是“边缘化”。这不仅是就其在社会文化总体格局中的处境，而且也是就其在整个文学学科中的位置来说的。尽管有不少热闹非凡的事件或争议，但支撑这些事件或争议的往往是一些伪问题。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新诗研究一直面临着两个基本难题：一是如何协调所谓谨严的学院化的历史研究与活泼的当下（跟踪式）批评之间的关系；二是在保持对各种诗歌现象和问题的历史感的同时，又显出对时下变幻的创作实践的持续敏感。它们其实是两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难题，又成为新诗研究遭人诟病的根由——僵化、空疏、滞后，是人们常常用来指责新诗研究的一些标签。

目前的新诗研究的确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可从两方面予以检讨：一方面是新诗研究（者）本身的缺陷，由于研究者丧失了钻研的耐心，或缺乏重新提问的能力，导致粗制滥造、重复无效的成果层出不穷；



另一方面是研究与外部环境的错位，很多研究者也许并未意识到，随着历史语境的变换，某一时期确立的研究观念和范式，在新的条件下会逐渐失去效力——社会文化语境的迁移，迫使人们对诗歌发言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有些新诗研究者在进行着某些重新清理的工作，譬如重返历史现场、重理理论概念、重拾文本分析、重提本体研究等等。不过，重返历史现场，不是要还原一个静态的所谓客观的过去场景，而是寻索可能被忽略的历史细节；重理理论概念，不是简单地弄清某个概念的来龙去脉，而是以“考古学”的态度，重新辨析概念生成的深层源头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错杂关联；重拾文本分析，不是止步于它的自律性和自足性，而是要留意历史氛围、制度策略、文化心理等“外部因素”，渗入新诗文本的复杂印迹及其对新诗文本样态与体式形成过程的塑造和影响；重返本体研究，不是重新回到某个局部或总体的本体观念，而是重新找到本体研究得以生根的语境及二者的新的紧张关系。

这些，或许就是新诗研究的生机所在。

目 录

在突围中寻求生机

- 新诗研究断想（代序） 张桃洲 / 1

上 编

困境、语境及其他

- 诗歌精神的重建 姜 涛 等 / 3

重新回到新诗的起点

- 从《“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谈起 段从学 等 / 28

格律与自由之辨

- 林庚诗学的意义 冷 霜 等 / 39

“不告别”：文本的社会性及其可能 张洁宇 等 / 57

重新探掘新诗批评的活力与效力 张桃洲 等 / 67

内外之间：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张桃洲 等 / 84

文本背后的新诗史：个人经验、审美话语与政治

- 关于《回顾一次写作》 段从学 等 / 99

谁、什么与如何

- 当前中学新诗教育的歧途 孙晓娅 等 / 107

当代诗的概念：范围、内涵与阐释

- 有关《当代诗》杂志 孙文波 等 / 123

“一个人去建造一座教堂”

- 重释骆一禾的诗学理想与成就 西 渡 等 / 137

下 编

“混杂”的语言：诗歌批评的社会学可能

——以西川《致敬》为分析个案 姜 涛 / 163

“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 姜 涛 / 179

“巴枯宁的手” 姜 涛 / 192

诗歌与社会：新的张力关系的建立 张桃洲 / 207

当写作的压力减轻后

——简论中国诗歌的当下境遇 张桃洲 / 215

如何重返新诗本体研究？

——从《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谈起 张桃洲 / 225

胡适新诗本体话语的差异性建构 段从学 / 234

回到穆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段从学 / 246

中国现代诗学的可能及其限度 段从学 / 251

一场关于新诗格律的试验与讨论

——梁宗岱与《大公报·文艺·诗特刊》 张洁宇 / 255

分叉的想象：重读林庚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新诗格律思想

..... 冷 霜 / 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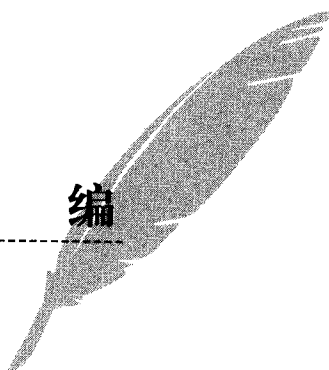
在两次“重写文学史”之间 冷 霜 / 299

新诗的“发生”与“诗性空间”的拓展

——从新出的两部新诗研究著作说起 易 彬 / 304

后 记 张桃洲 / 314

上 编



困境、语境及其他

——诗歌精神的重建

参加者：姜 涛、张洁宇、张桃洲、段从学、孙晓娅

上篇：何谓“诗歌精神”？

孙晓娅：提出这个讨论命题的缘起是有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新诗陷入了困境，如何在这种困境中寻找新诗以及新诗研究的出路，应当格外引起关注。我始终恪守一种观点，那就是诗歌的处境其实可以彰显人的存在和精神的真实处境，如果说诗歌萎靡，那么，最直接的原因是人的创作力的衰弱和精神的居无定所，正如有一句诗写的：“四处为家的人是无处有家”，这也等于说“无所不在等于无所在”，蒙田也曾说过，“灵魂如果没有确定的目标，它就会丧失自己”。既然诗歌可以让我们的灵魂在深处寻找到生命的真实，我们又可以从诗歌当中拾起什么呢？诗歌提升人类文化品格和情感境界，而我们又能为诗歌提升什么呢？置身当下，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昔日以诗的灿烂和繁荣为自豪的泱泱大国，今日的诗歌却变成了文化领域的装饰品和传媒炒作的焦点，作为在倾心寻找诗意地栖居的新诗爱好者和研究者，我们有必要为新诗寻找一个栖居所在，因而我们的青年学者沙龙的初次讨论指向了“诗歌精神”。根据我们的安排，下面请张洁宇先发言。

张洁宇：我理解晓娅提出这个议题的背后，是有她对当下诗歌创作现状的关注甚至批评的。我赞成把这种对当下的关注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它其实是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诗歌精神”这个问题。但我想，在提出问题之后，还是应该从现实关注的角度再回到历史的考察，看看新诗的历史上是否存在着某一种诗歌精神，如果有的话，它又是怎样发展和变化



的。如果能梳理这样一条线索，也许我们就能回答，现在诗坛的问题究竟是一种诗歌精神的失落，还是诗歌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一种演变。我记得谢冕老师曾经提过类似诗歌精神“转型”的问题，认为现在诗歌完全变为个人化写作了，对此他是有一种焦虑和批评的。其实我觉得不必那么焦虑，甚至不必有过多的价值判断。我们不妨历史地考察一下诗歌精神的内涵及其发展历程，这个梳理本身说不定就能解决一些问题和困惑了。

张桃洲：“诗歌精神”这个词让我回想起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那场讨论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声势非常大，反响也非常大，很多人都卷入其中。不过，后来不少人觉得那次讨论是一场错位的讨论，因为究竟何为人文精神、究竟要不要人文精神，不同的人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很多时候人们并不在同一层面上说话。也就是说，人文精神讨论的价值和成果并不是那么一致地合乎人们的期待或想象。如果可以做一个类比，我想我们今天讨论诗歌精神，需要明确的几点是：究竟什么是诗歌精神？如何理解当前社会语境下的诗歌精神？倘若确实有诗歌精神这一说法的话，它有哪些几个层面？

姜涛：在人们通常的表述里，所谓的“诗歌精神”当然有多个层面，如主体的高扬、对现实历史的批判、理想主义或英雄主义等，逐一去界定当然是一种讨论方式。但它首先是一个历史化的概念，或者说不同的时代氛围会塑造出不同的精神渴求，也会培养出不同的接受方式，我们对“诗歌精神”的想象或许不是来自诗歌自身，而是来自外部的文化需要。我们今天讨论的“诗歌精神”，重要的或许不是辨别诗歌精神的定义，而是回到具体的时空、具体的语境，关注诗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凸显出来，并与历史发生了有效关联，为同时代的读者提供了怎样的精神资源。因此我觉得讨论这个话题，还是像刚才洁宇讲的那样，要找到焦点，甚至要找到一个特定的时刻，才有可能进入。

张桃洲：我刚才提到的诗歌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类比关系，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按照我的理解，晓娅提出这个话题的起因，大概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诗歌陷入了一种委顿的状态，可能就像很多人指出的，诗歌里庸常的东西增多了，日常的琐屑的语言占据了诗歌的主要位置，诗歌好像失去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少了介入现实的能力。这就有点类似于当初人们呼唤人文精神时所说的：人文精神衰落了！晓娅提出这样一个话题的

动因、背景是能够让人理解的。所有这些发生在诗歌里的变化、现象，的确构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变成了：诗歌在进入90年代以后应该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处理、书写现实。不过，当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并进行思考时，可能会引起另外一些问题。比如人们常说，80年代是一个抒情的年代，90年代是一个叙事的年代。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忽然发现：他所熟知的那种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的诗歌不存在了，诗歌似乎一下子陷入了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然而，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到了90年代，那种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的诗歌是不是必需的？是不是必然有效的？诗歌写作是否一定要延续80年代那种昂扬的气概？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不难发现，进入90年代之后，整个的社会环境、人们所面对的问题、大家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以及所有这些带给诗人的经验，都发生了堪称剧烈的变化。在这种情形下，以对80年代诗歌的追怀来批评或要求90年代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对的，但很有可能会遮蔽90年代诗歌的真正症结所在。

的确，在90年代以后，人们所认为的那种诗歌或者说所期待的一种诗歌精神好像是没有了，但实际的情形或许是，在90年代，诗歌写作和诗歌精神转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比如说写作成为对某种个人的更加隐晦的经验捕捉，或者它采取了一种不一样的与现实、与整个社会环境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变得更加隐蔽、不易被人觉察。我充分感受到诗歌精神这个话题的提出，显示了90年代以至当前诗歌某种变化所带来的焦虑和失落情绪。这让我不得不再次提起人文精神的讨论，比如当时有一部分人就把人文精神理解为抵制由商品经济带来的价值、理想、道德滑坡。可是，人文精神是否需要为某种理想、道义负责，或者说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道德滑坡之间是否构成必然的联系，则是需要重新检讨的。对于90年代以来的诗歌同样如此，说90年代诗歌必须对当前诗歌的边缘化、诗歌状况的混乱或困境负责，似乎有点错位。不同年代的诗歌有不同的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的确，我们要重新呼唤诗歌的精神，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站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语境变化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要充分考虑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里面整个诗歌写作所出现的迁移。

我想起最近应《星星》诗刊之约写了篇文章，题目是《诗歌的至高律令》，主要是回应这几年讨论得很热烈的一个话题——“底层经验”与诗



歌写作，我的基本观点是要对人们大呼的“底层经验写作”持保留意见。之所以谈到这一点，因为我觉得提到“诗歌精神”这个词，会很容易滑向一种“道德诉求”。所谓“底层经验写作”，是一种典型的凭借某种道德优势来掩盖文学自身问题的做法。其实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文学或者诗歌，在与时代、现实以及各种具体的问题或命题打交道、发生关联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语词方式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种现实的道德的方式。我们在这里谈到诗歌精神的时候，我觉得要避免使这样的话题滑向道德的层面。我刚才提到，80年代的诗歌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氛围，是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在80年代的语境里诗歌精神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它的确是一种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它本身就在那里，非常显眼，不用刻意提及；而到了90年代，这个我们可以捕捉的东西好像不见了，散掉了，隐蔽起来了。这里我只是说它是隐蔽起来了，至于它究竟是散掉了还是变成了别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从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同语境来看待。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的诗歌精神，不能用80年代的诗歌精神来衡量90年代乃至眼下的诗歌；如果90年代的确需要一种诗歌精神，那么90年代的诗歌精神这一问题其实变成了：在90年代，诗歌写作如何是有效的？

姜 涛：我接着桃洲说两句，他刚才说到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社会氛围的变化对于诗歌的影响，我也比较认同这种说法。我们通常说到的80年代的理想主义，它的整体感是来自特定情境的，如果没有那种情境、那种结构，80年代独特的诗歌气质也无法形成。到了90年代，破碎与乏力之感不光是诗歌界的现象，整个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也似乎经历了同样的变化，80年代激进的、昂扬的情绪普遍消失了，与思想相关的活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或者说是学术化，诗歌写作的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也暗示了变化之中包含了某种历史的有效性。从这一点出发，其实我们可以关注诗歌进入历史的特殊性问题。

现代诗歌有一个伟大的理想，那就是提供一种特殊的回应历史的精神方式，而且它是不能被其他的知识类型，如哲学、伦理，甚至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所覆盖。比如，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强调诗歌要有所承担，这自然是合理的要求，但有的时候，诗歌的承担方式恰恰是什么也不承担的，通过不承担任何现成的教条，来承担一种更高级的责任，这就是臧棣的那个有名的讲法：诗歌除了高贵什么都不承担。听起来，这句话可能有点空洞，



但恰恰是“空洞”保证了它的灵活和不凝滞，因为诗歌最终不是提供一种实体性的答案，而是另外一些更抽象的东西，或许可以简单地说是一种想象力，是现实秩序之外的另外一种秩序，等等。桃洲带来的那本书《19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中，有雪莱的《为诗一辩》一文，讨论的其实就是这个。为什么雪莱说“诗人是未被承认的立法者”呢？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诗歌已经被边缘化了，从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诗歌只是人类情感盲目的产物，已无足轻重了。针对这种批评，雪莱所要捍卫的恰恰是诗歌某种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为诗一辩”也成为现代诗歌的一种传统。

另外，我刚才提到诗歌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问题，这里需要再补充一下，那就是面对时代生活的诸多层面，我们强调诗歌的精神价值，并不等同于将诗歌放在一种公共的价值尺度中去评判。诗歌所提供的或许不是结论，它与人的关联甚至是十分隐秘的，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那些看似与时代无关的写作，才真正进入了时代核心的黑暗之中，这也许是诗歌的奥秘之一吧。

张桃洲：我仍然觉得，谈论20世纪90年代及当前的诗歌，或者说我们在今后要倡导一种诗歌精神，应该更多地着眼于诗歌本身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90年代以后诗歌怎样把诗歌精神体现为一种诗歌内部的钻探。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正在进行这种钻矿一样的诗歌探索，包括60年代出生的一批诗人，还有70年代出生的部分诗人。事实上，的确有这么一批人在诗歌的内部领地，各自在潜心地探寻一些真正是诗歌与这个时代的一种对话的方式，通过诗歌的方式来与现实的各种事件对话，而不是通过一些外部的命题来呈现诗歌对现实的关注。80年代以来诗歌承担了很多外在于诗歌自身的东西，包括它所获得的巨大声誉和非常隆重的英雄般感觉。我认为诗歌应该是一个时代非常隐秘的力量（也许这种说法还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它的方式不是大众式的。这使我想起20年代白采的《羸疾者》这首长诗，是很有意思的。诗里的主人公就是一个羸疾者，患有多种身心的疾病，但是他在诗人笔下又是以一种尼采式的英雄形象被塑造或期许的。在这个羸疾者身上肩负了很多悲慨的、超越了某种尘世约束的情怀。这似乎是一种悖论，但这首诗的确提供了那个年代对英雄、对诗歌的英雄主义的想象。这种英雄主义，也许就是那个年代的诗歌精神。可见，诗歌精神这个词的含义，在不同的年代是变化的。



张洁宇：对。我们介入生活、介入历史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了。90年代以后的很多讨论其实都与此相关。包括一些诗人自己也在谈论这种变化及其在作品中的呈现，批评家们也在讨论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我比较认同的一种态度是：不以一种固有的价值标准去评价，而是积极地认识这种变化。在我看来，很多诗人是在有意识地寻找一种新的、属于自己的诗歌方式，这种新方式的尝试当然会带来改变，失掉些东西、弱化些东西，但同时一定也会产生些新的东西。

姜涛：的确，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进入历史的方式，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诗歌，读者和部分批评家总在抱怨相对于80年代的诗歌，这些作品过于个人化，远离了公众生活的兴奋点，也缺乏对现实的关注，而这种印象恰恰是一种误解，因为90年代诗歌的一个主要追求，就是要在历史与想象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更为复杂、更为内在，公共的识别程度不高，不能被一般阅读所揭示罢了。因此，我觉得诗歌精神的有无，或者说诗歌介入历史与否，不仅是一个写作的问题，同时也是阅读的问题，即个体对历史的特殊担当，能否获得公共接受的问题。这也是某种文化整体性瓦解之后的表现，不只是在诗歌界、文学界，即使是在学术研究中，不也充满了对话的艰难吗？公共性的丧失在当代文化生态中似乎是结构性的。

张洁宇：这也包括所谓“知识分子”和“民间”的那些争论吧？

姜涛：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民间”，在一些粗俗的诗歌论争中，其实都被立场化了，成为一种攻讦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不必太认真地对待，因为在当下的语境中，这些立场都很抽象，缺乏现实性。比如在“民间派”的主张中，有一种激烈的抗辩色彩，这些策略在80年代的确是有现实性的。在那个时代，当我们阅读韩东、于坚等人的作品时，读到的不仅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琐屑，还可以感觉到有一种特殊的张力包含在其中，或者说能感觉到他们的写作在和什么东西叫劲，用于坚的话来讲，这个东西叫“庞然大物”，指的是一整套教条化、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念和生活理念。因而，后朦胧诗歌虽然“PASS”掉了北岛们的崇高感，但他们的身上仍洋溢着某种英雄主义色彩，只是结合了中国底层社会的草莽精神和先锋派的虚无感，表现方式不同罢了。所以，在80年代不同的诗歌流派之间，你会感觉到某种相似的气质，洪子诚老师就说到一个有意思的现



象：四川的莽汉派，到了上海就变成了撒娇派，骨子里可能是一回事。问题是到了今天，当年的“庞然大物”其实已经很虚弱了，或者说早就转换了内涵，依旧慷慨激昂地扮演反叛的英雄，贩卖所谓生命、身体、欲望等口号，实际上已没有了当年的现实性。因为，这样的诗歌恰恰是最安全的，最吻合于一般社会想象的，或者说这样一种叛逆本身就是被纵容的，被消费时代的无度个人神话所鼓吹的。他们抗辩的对象，实际上已是一个假想的敌人，而他们的背后无意识，恰恰是一个新的“庞然大物”，与原来制度化的意识形态教条相比，它无疑更隐晦了，但冥冥中操控了一切。

挪用草根、底层这样一些概念，来倡导一种写作方向，这种意图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就是桃洲所说的，这样的外在伦理尺度，如果不能内化于诗歌，那也只能激起一时的话题，不能提供真实的认识。

张洁宇：刚才姜涛说的一个问题我很同意，就是许多调子很高、看上去特别富有诗歌精神的作品或主张，其实是非常空洞的。那种很有道德感、很正确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诗歌精神。

姜涛：我们都说诗歌被边缘化了，但诗歌文化在中国其实很发达，比如我遇到过一些地方官员，像小书记、小处长之类，喝多了酒的时候都会大谈诗歌，显得很有诗歌精神，在一般的晚会上，也经常会见到的夸张、高调的诗歌朗诵。这些现象，可能都和我们的政治抒情诗的传统有关，但恰恰是这些东西，可能已和真正的诗歌精神无关了。

孙晓娅：以往有关诗歌精神的探讨都集中在诗歌的道德价值、文化功能和社会使命等外在于诗歌的一些问题，而我们是要回到对诗歌本体的探掘。

张洁宇：其实从新诗的历史来看，诗歌已经承担得太多了。从一开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和旗帜，到后来政治抒情诗的那种姿态，包括后来朦胧诗的崛起等等。诗歌在每个时代虽然承担的东西不同，但所承担的的确都是诗歌之外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内在于诗歌的精神。

晓娅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诗歌，气象越来越小，所以会让人产生委顿的感觉。

孙晓娅：我很认同洁宇在此处使用“气象”这样一个富有弹性和张力的词来批评 20 世纪 90 年代的诗歌。显然，洁宇已经注意到这里存在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是不是因为 90 年代诗歌写作的日常生活化、私人化，就



消解了当代诗歌的创作价值？90年代以降是否有自觉坚守诗歌精神进行创作的诗人？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分别是否定和肯定。当诗歌精神内化为诗人个体紧张的思考时，当诗歌精神被平淡的、日常的生活对象所承载时，当诗歌精神以反叛、批评、内省的方式呈现出来时，需要我们思考的恰恰是：如何回到诗歌本体，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诗歌精神在不同阶段的内涵、指向、承担的社会角色和读者的接受与共鸣，从多元的维度给予诗歌精神一个开阔的阐释场域。仍然回到洁宇刚才提出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当下依然有一部分诗人始终将诗歌精神悬系于创作的神经上，但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个人的因素，却改变着诗歌精神的内涵和分量。例如，同样侧重于理性的思考，西川与前辈诗人的理性精神所涵纳的诗歌精神却明显不同。

姜涛：刚才桃洲提到一个问题，现在这种诗歌之中的“伪精神”比较多，对此我有一个看法，精神问题的真伪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是与精神尺度存在的方式有关，诗歌带给人的扩张力、揭示力，其实来自一种紧张感，而当下诗歌写作的问题或许就出在了紧张感的缺失上。有的诗人保持了高调的精神向度，也通过写作来实现某种超越性，但关键是一切似乎都模式化、自动化了。另一些诗人则自觉回避了“主题”的压力，更多看重语言自发的活力，对刹那的、即兴的、无度的语言可能性的挥霍，但单纯对语言快感不加反思的追求，导致的可能正是活力的丧失，造成诗歌空间的缩减。无论采用怎样的方式，上半身也好，下半身也罢，部分当代诗人似乎缺乏焦灼感，缺乏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的愿望，都在各自的世界里心安理得地写下去，很坦然，也很自得其乐，但一种对自我质询的能力也会逐渐萎缩。这可能构成今天诗歌一个很大的危机，由于丧失了独特的紧张感，诗歌写作就容易滑向一种亚文化状态，就像你玩滑板、搞园艺、喝茶、同性恋一样，只是纯粹的个人行为。

孙晓娅：就是说诗人缺少来自异己的声音，那些貌似从容的写作，其实无法承载个体灵魂和现实之重。这种精神活力，很容易被诗化出来，关键是价值何在。

张桃洲：我想插一句，刚才姜涛讲的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我在准备这个材料的过程中，发现骆一禾的价值需要重新认定。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他对中国诗歌，特别是当代新诗的一些构想，当然骆一禾的诗歌写作同80